

中国民间意见领袖

薛涌

A Voice of the Grassroots

著

草根才是主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草根才是主流

薛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根才是主流/薛涌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11
ISBN 7-5613-3738-8

I. 草… II. 薛… III. 时事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9807 号

图书代号:SK6N1176



草根才是主流

著 者:薛 涌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孙国勇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工作室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北京市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280 千

印 张:18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3738-8/I·419

定 价:28.00 元

主流经济学家批判 001

再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002
从世界史看经济与民主	004
产权不对称	006
张维迎:你是改革还是反改革	008
自由经济还是寡头经济	010
“自由派”为何失去民心	013
不理性的“理性思考”	015
精英的理性和小民的直觉	017
“自由派”经济学家为什么怕“自由”	020
改革需要理念的撞击	022
高学费真对穷人有帮助?	024
网络民主与群体智慧	026
不要以“文革”心态对待公共辩论	028
市场经济中的伪君子	030

财富态度:怎样对待穷人 033

垃圾中生活的人不是垃圾——Pawar 女士与印度的崛起	034
拆迁中的中国经济	038
美国工人怎么下岗	040
蔑视穷人的代价	042
富人要有什么派头	044
“仇富”是仇什么	046
穷人凭什么给富人腾地方	048
流浪人员是人,不是病毒	050
纪念 911——美国怎样补偿那些死难的孤苦无告者	051

全球化中的贫富	053
两位美国穷人的命运	055

中外富翁的财富观念 ■ 059

中国的富人为什么不捐钱	060
好事自己做——新大亨的慈善观	062
卡耐基与美国的慈善传统	064
巴菲特为什么要把财产给盖茨	067
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070
房地产不是暴利产业	073
我们怎能听任任志强得势	075
财阀学阀,欺行霸市	077
民不可辱	079
为什么商品房的成本应该公开?	080
既得利益者的道德底线	082
美国的房价	084

网络、媒体与公共空间的建设 ■ 087

用博客激活语文教学	088
馒头,屁,博客	090
我要博客,我要革命	092
网络文化的反智主义精神	094
美国人为什么比我们尊重长辈	096
就“抄袭”事件答王晓渔	099
“日本版画事件”错在何处	100
我错了	102
日本版画事件拷问中国人的良知	103
给媒体成长的时间	105
假如明早醒来,我们的母语变成了英文	108

北大批判 111

北大、清华将被香港的大学扫成二流	112
北大为什么是二流	113
北大是什么心态	116
北大、清华要甘当二流	119
名校野鸡化,北大当先锋	121
大学应该怎样对待文化旅游	123
如何对“天价写作班”进行道德审判	125
彩票是个什么学科	128
怎么办名校	129
怎样公平地招生	131
北大在干什么	133
海外学者何必和北大站在一起	135
是谁惯坏了教授	137
破除专业教育的迷信	139

全球竞争形势下的中国高等教育 143

进入世界高等教育的 WTO	144
狼已经来了,老虎还远吗?	147
香港的大学带来了什么冲击	149
香港的大学比北大、清华高在哪里	150
北大、清华当名校的日子屈指可数	152
如何面临美国高考的挑战	154
全球化与现代性中的“孟母学堂”	156
保卫“孟母学堂”	158
访问学者为什么拖家带口地出国	160
建设中国的社区学院	162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教材	163
新东方的新方向	165
中国大学生应该拿多少奖学金	168

大学要为全正国们做好准备	170
大学要对老年人敞开大门	172
教授保姆与孟母	174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应该怎样进行? ■ 177	
大学市场化的改革不能再拖了	178
增加国家奖学金	182
产业化不是教育改革的替罪羊	184
中印大学的比较	186
何不减免学债	188
以大学税代替教育贷款	189
引进博士候选人制度	191
展望即将发生的奖学金大战	193
技工吃香对大学改革的启示	195
除了哈佛我们还应该知道什么	197
香港: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心	199
香港是中国的文化沃土	201
精英主义与草根主义	203
我们应该接受什么样的大学教育 ■ 207	
哈佛学生选什么专业	208
在哈佛必须学什么?	210
大学为什么要尊文史	212
大学教育要有“核心课程”	214
大学教育要经世致用	216
大学生怎么就不能扫地	218
大学生的住所与大学的理念	220
大学生不是专业奴	222
考大学报什么专业好	224
新闻无学	226

美国人大学毕业要欠多少钱	227
“通识教育”的革命	229
高考:带着锁链也要跳舞	231
高考面能否放宽	232
在大学里要做的 20 件事	234
怎样给管理和法学类专业降温	236
重新“上山下乡”	238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情感 241

伟大的文学,需要伟大的心灵	242
中国能创造体育吗?	243
把中国建成自行车的天堂	245
中国的月亮不如外国的亮	247
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北京	248
我们不能回避性道德	250
致李银河:我为什么要和你辩论	252
尊重单身并不等于妖魔化婚姻	255
李银河,请不要起诉《金陵晚报》	257
启蒙陷阱中的李银河	259
上帝是否决定了我们的贫富	261
影响我的三本书	263
我没有钱,但挺“主流”	265

附 录 269

薛涌其人其文	郑也夫 270
薛涌:在美国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何三畏 275

主流经济学家批判

薛 涌 XUEYONG



再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

两年前,我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但标题被改了。后来,这个标题,成为我新著的书名。

2005年出现过郎顾之争,人们对以产权为核心的改革越来越怀疑,自由派经济学家的名声越来越不好。其实,我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对自由派有天生的同情。不过,我对中国的自由派,一直有着强烈的批评。他们不听我的批评,也是陷入今天的困境的原因。我希望我的新书对他们的理论有所修正,使得自由派能够重新出发。

记得两年前,陈志武先生在纽黑文请我和国内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一位代表人物吃饭。这位自由派是厚道真诚之士,所以大家废话没有,很快进入了观点的交锋。我当时提到自己的文章《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他马上直言不讳:“这种话我一听就烦。不打工怎么办?美国人不打工吗?”我说中国的发展过分依赖外资,对工人的权利保护不够,老百姓挣得太少,自己无法发展,除了永远给人打工外别无出路,等等。他马上驳斥:“打工是老百姓愿意。他们不打工能干什么?打工是发展的开始。工资那么高,还有什么竞争力?”我问美国人工资高,怎么还有竞争力呢?他随口就说:“你看看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你回来看看咱们的企业。美国争不过咱们才说咱们工人的工资低。”

这次饭局上的辩论,最清楚地体现了我这个海外自由派和国内自由派的不同。我的基本信念完全是新自由主义的:充分的市场竞争,是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但是,最充分的竞争,是排斥垄断的竞争,是使最小的经济体有参与机会的竞争。要想保护市场的充分竞争,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必须保护这些最小经济体的利益。为什么?因为“小的是美好的”;最小的经济体最有效率。

那么,什么是最小的经济体呢?最小的经济体就是个人,就是家庭。社会要保证这些经济体得到公平的报酬,挣得足够的资本提升自己的层次。比如,一个工人家庭,挣的工资不仅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且还可以投资子女教育,使下一代“产业升级”。这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长远保障。如果都像我们这样,民工有时甚至拿

不到工资,子女入学也受歧视,那么民工的孩子就永远是民工,盲流的孩子就永远是盲流。即使中国未来想发展高端产业,民工的子女连受教育的机会也没有,你哪里找未来高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的发展,无异于杀鸡取卵,因为眼前的利润牺牲长期的发展目标。

我不妨举个活生生的例子。福特汽车公司最近陷入大危机,裁员3万。以后说不定会倒闭。这大概证明了那位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话:“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试想,工人的年薪五六万美元,外加一大堆福利,退休人员优厚的退休金也扛在肩上,还怎么和我们年薪不到两千美元的工人竞争?这话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真理。当时有眼睛的人就能看明白:美国的家用电器,美国的汽车,早晚要被日本打败。高工资伤害竞争力,似乎成了不争的事实。

但是,随着美国的家电市场、汽车市场纷纷被日本和韩国占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美国国力和经济效率的直线上升!这二十多年,美国从劳动生产率、人均收入等指标上看,都明显高出日本和欧洲一筹。为什么?家电工厂倒了,今后汽车厂也会倒,但是,这些企业虽然瓦解,美国最小的经济体(即个人和家庭)的竞争力却是有保证的。人家有高工资,高福利,人家送孩子上大学,下一代摇身一变成了软件设计师、医生,家庭作为一个经济体升级了。全社会都这样,经济当然就有后劲。

这次福特的危机,尤其让人感慨万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福特正在考虑,给几个工厂被解雇的工人提供上大学的学费,15000美元1年,保证4年的大学学费!人家企业火都上了房,还不得不花这个钱。你还指望这个企业能生存得下去吗?但是,人家的市场经济成熟了。在大企业和社会的最小经济体之间,有制度保证小经济体的利益。人家怕的不是一个福特公司的破产,怕的是成千上万工人、家庭的破产。只要这些小经济体能存活,保持竞争力,国家就会有竞争力。毕竟后者才是社会的细胞。

所以,我在书中提出的,是一个新自由派的理念:中国的未来决定于充分的市场竞争。这一竞争的基础,就在于最小经济体(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福利和素质。倒几家大企业没有关系,GDP上涨慢一点没有关系,但是,老百姓在医疗、教育上的基本需求必须满足。一个民工,必须有足够的能力投资于自己的孩子,使之长大后不再是民工。以牺牲这些小经济体为代价发展大企业,无非是一种变身的计划经济。

从世界史看经济与民主

最近又有一位“主流经济学家”李稻葵出来说话，称印度的经验证明：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民主制度应该缓行。此论已经受到许多人的驳斥。不过，人们很少论及经验性的证据。既然经济学家是最讲究经验和实证的，我们就有义务检讨一下他们的结论的证据。

只要看一看世界各国人均 GDP 的排名就知道，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中国排在第 118 位。在这个位置之后的主要民主国家，大概也只有印度了。面对这样的经验事实，不喜欢民主的人自然要解释：那些民主国家发达证明民主只适合发达国家，而并非它们因为民主才发达。印度这一孤证，也就使这样的人如获至宝：看看，民主了半天，怎么还那么穷？

李先生要把自己的话说圆，至少应该论证一下：那些人均 GDP 排名靠前的国家，是否都是先发达后民主的？这就不得不看看历史。事实上，人类历史的经验表明，民主常常在落后地区发展，并后来居上。如今的世界格局，只能证明民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优势。

先看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希腊文化发达，经济繁荣。但是真论财富，则比不上东方。这一点希腊人自己也明白。希罗多德在记述雅典的立法者梭伦和东方君主 Lydia 国王 Croesus 的对谈就很说明问题。当时 Lydia 是最富有的国家，Croesus 向梭伦炫耀自己的财富，并问梭伦谁是世界最幸福的人。梭伦举出的两个最幸福的人，都是希腊人。Croesus 火了：难道我拥有的一切都不算数？梭伦意味深长地说：你还没有到你人生的尽头，我怎么可以下结论？梭伦的话，不仅预言了 Croesus 的个人命运（他不久就成为别人的阶下囚），而且也预言了他所代表的制度的命运：专制会一时聚敛财富，但其繁荣却不可长久。

如果这样的例子太遥远，我们不妨看看导致如今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历史分途的 18 世纪。当时的中国，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点，连亚当·斯密也没有置疑。不过，亚当·斯密做出了预言：中国只要制度不改革，其发展就已经走到头了。结果几十年后，他的话就应验了。率先崛起为世界帝国的，是英国。其繁荣的

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君主立宪制。在这个制度下,靠选举产生的议会,逐渐控制了政治权力。没有议会的同意,国王不能加税。比如,国王打仗需要经费,但议会不同意加税,国王只好借债。同样是因为君主立宪的制约,国王借钱后不敢赖账,必须偿还。结果,虽然王室债台高筑,财政信誉却比其他政府高,商人愿意把钱借给英王。这就出现了18世纪的奇观:最缺乏敛财能力的英国王室,是最有钱的王室。大家打仗打到最后都没有钱了,只有英王还能借来钱。英王的财政信誉和借贷,创造了现代的金融结构(包括股票市场),奠定了大英帝国崛起的基础。

民主的好处,就是限制政府绝对的权力。这种受限制的权力,在短期内当然可能不如不受限制的权力有作为。比如,在16、17世纪,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白银,英王着急,但无法加税敛财,没钱修军舰,争不过人家。结果呢?到18世纪,白拣了银子的西班牙帝国衰落,政府手头拮据的大英帝国反而崛起。美国的兴起何尝不是如此?当年的北美殖民地,很难算是经济发达地区。但最后还是民主制度造就了这个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可笑的是,李先生在一次讲话中还特别举出了美国的例子:你们看看,克林顿要搞医改,既得利益那么多,都出来讨价还价,改得动吗?布什搞社安改革,改得动吗?还是我们有优势。他也不想,当年克林顿的医改计划谁来埋单?账不算清楚就改,国家财政怎么承受?美国有句笑话:18世纪的一位医生,每年冬天休假打猎,不看病人。而这也是唯一一个他没有杀死人的季节。政府有时也是如此。什么都不干反而更好。民主制度限制政府的莽撞行动,因为那太危险。这并不说明民主没有效率。如今,麻省就开始实施类似克林顿构想的医改了。成败目前虽未可知,但局部实验会为全国提供经验。这样慢慢推进,并不说明民主的荒唐,而恰恰说明民主的优越。

再看看印度:如今基础设施那么差,外资仅相当于中国的零头,但GDP的增长率已经接近中国,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现在更看好的是印度。《华尔街日报》不久前还特别发表社论,提醒中国不要从印度学错了经验。事实上,民主制度正在帮助印度的经济起飞。印度的法制,不管多么缺乏效率,目前也已经成为印度对中国的一大优势。也正是在这样的法律制度的保护下,印度才能发展出中国还没有的世界一流企业。

也许,我们应该感谢李先生无意中的“真话”。看看如今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反感互联网、反感媒体、反感“投票”、反感老百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李先生对印度的蔑视也就不令人奇怪了。不过,我还是要搬出希罗多德的老故事,请他们记住梭伦对Croesus讲过的话:第一,财富本身并非是幸福的尺度,我们不能用经济

发展衡量一切；第二，即使谈经济发展，也应该耐心一点，看看谁笑在最后。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终还是民主给人们带来的利益最大。

产权不对称

产权问题，是当今改变大辩论中的一个核心。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遭到网民的炮轰。如果孤立地看，他们的主张并不一定错。比如，国营企业确实要经历一个私有化的过程。不过，界定产权有两个面向。一个是狭隘的经济面向，孤立地针对企业，确认企业归谁所有；另一个则是社会的面向，即产权不过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个延伸：企业的所有权要界定，老百姓的所有权更要界定；没有后者，就谈不上前者。

“主流经济学家”的失败，主要在于他们只从第一个面向来理解产权，只站在企业的立场说话，似乎企业的利益就是老百姓的利益。这样片面强调企业的产权，忽视老百姓的产权，就会造成一种“产权不对称”。

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论功行赏的经济：谁的贡献大，谁的收益就高。我曾反复强调，比较中美经济，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其技术和管理优势，因此在这两方面能力突出的精英阶层收入大大高于他人。反观中国近20多年的经济成就，简单劳动力的含量最大，管理和技术上的含量非常低。可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一般劳动阶层贡献最大，精英的表现乏善可陈。但在分配上却反过来，精英太富，老百姓太穷。这里体现的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竞争，而是“产权不对称”的结果。

中国最没有产权的是谁？是农民。他们至今还没有土地所有权，乃至一纸拆迁令，就得眼巴巴地看着大公司在自己的土地上盖楼。当他们丧失了基本的产权后，只能进城给企业打工，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筹码。结果，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刺激了低端制造业的发展。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于是欢呼：这是自由经济的胜利。其实仔细一分析，这哪里是什么自由经济的胜利，这分明是不自由经济的暴利。这种暴利，在短期内可以创造令人眼花缭乱的经济繁荣，却给中国的长期发展留下一个硕大的陷阱。应该说，任何后发型国家，都必须从低端产业干起，利用自己劳动力便宜的优势。但是，这些国家同时也必须面临另一个挑战：一旦经济起飞、生活水平提高，

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就会丧失；所以必须及时利用初期发展的积累，提高产业层次，向高薪社会过度。从日本的经验看，这个“机会窗”不过就 20 年的时间。1950 年代初期，美国明确告诉日本：你们太穷太落后，根本不具备为美国市场提供产品的能力，还是盯着便宜的亚洲市场吧。但到 1970 年代初期，一系列的日本公司成为国际一流企业，日本人的工资也很快接近了欧美的水平。中国改革了二十五年，我们起步在低端上，如今还站在低端上。甚至还很难想象再过 10 年中国会出现几个像索尼、丰田这样的品牌。为什么？一大原因就是“产权不对称”。在中国的企业，有不少（如外资）是有明确的产权的；即使许多国内企业，理论上没有明确的产权，实际上还是拥有一些模糊的产权。但老百姓特别是农民，产权得不到最基本的保护。这样，有产权或模糊产权的企业，可以从丧失产权的民工身上牟取暴利。这种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暴利，惯坏了企业。结果大家不操心改善管理，不认真更新技术。这样下去，哪里还会有世界一流企业？

这也是我不久前和周其仁辩论的一个焦点。他概括出一个“衬衫经济学”，满眼春光地歌颂大好形势：“不能不看好中国”。我则要揭示这种貌似自由竞争之下不自由的现实，以及下层社会失去经济自由的危险后果。如今，中国经济起飞 20 多年，沿海大城市生活费用高了。从今年开始，中国年轻人口的总量开始下降了。企业一下子面临着民工荒。在“产权不均衡”的条件下成长的企业，没有想过节省人工的问题，无法跳出劳动力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当我们的劳动力少了、费用高了以后，外来制造业自然会移师印度、越南。而我们长期对民工的歧视，使其子女很难接受良好的教育，没有供应高端产业的充足人才。在未来 20 年，靠什么和人家竞争？

所以，即使是抛开人人平等的价值，就经济谈经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们也不应该忙着给几个大型国有企业当独董。真正需要他们帮助的，是农民。产权最容易被界定清楚的，也是农民。如果农民有了土地所有权，如果我们的法律能够保证他们的这种权利，就等于给了几千万家小企业启动资金。这些农民可以经营自己的土地，也可以把地卖掉，带着所得的款项进城创业。中国社会一下子有了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小业主，而不是廉价的打工仔。他们会拉动内需，他们会刺激私营企业的创意；未来世界一流大企业，也可能从他们中发展起来。保证他们的权利，才是产权改革的最大胜利。

张维迎：你是改革还是反改革

张维迎教授曾经在会上即兴发言，说改革中既得利益受损害最大的是干部，应该进行补偿，引起媒体的轩然大波。这些言论是根据未经本人过目的记录，无法严格地算做他的思想。如今，他在《经济观察报》接受记者采访，而且亲笔写了“改革中的利益补偿问题”，总算为我们了解他的立场提供了一些根据。

许多人说话时嘴没有把门的，但下笔时有许多“政治正确”的考虑，谨慎得多。从张教授这篇四平八稳的文章中，看得出他也不是例外。不过，即使是四平八稳，他的文章基本上还是证明了他那些引起人们争议的言论并非媒体炒作的谣言。张教授的核心观点是厘清改革与革命之分：“革命是通过暴力和强制手段将财富和权力从一部分人手里剥夺后转移给另一部分人”，“改革必须尊重原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不应该使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按照这个原则，如果具体的改革措施会带来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同时会导致社会中一部分人利益受损，此时，受益者有责任从自己所得的增加中拿出一部分补偿（“赎买”）受损者，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改革了。”最绝的是下面一段：“计划体制下，相对于农村的人，城市人就是既得利益阶层……所以，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时，就必须给城市人副食补助，而当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升时，政府并不补贴农民，因为农民不是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接着他进一步论证：对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应该补偿，否则就会以“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来代替明补。

是谁告诉张教授改革“不应该使任何人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的？比如在中世纪，欧洲的领主对其庄园中的未婚女子享有“初夜权”，这个规矩被“改革”掉了后，领主是否比原体制下生活得更坏？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被改革掉后，许多白人丧失了过去的既得利益，人家得到补偿了吗？从另一方面说，黑人不是原来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按张教授的推理，在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后，他们还应该继续受种族歧视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因为他们反正过去也没有既得利益。张教授的话无非是强调，改革要补偿过去不合理制度下的强势集团，而不是弱势集团。比如，干部应该得到补偿，否则人家就该腐败了。那么请问，难道你补偿了这些干部，他们就

不腐败了吗？再往前推一步，现在许多干部已经腐败了。一旦改革这种滋生腐败的制度，这些腐败的干部就丧失了既得利益。比如贪污 500 万的干部，比贪污 100 万的干部丧失的既得利益更大。我们是否应该按照他们贪污的程度计算他们丧失的既得利益，在改革后对他们进行“补偿”、给最大的贪污犯发最高的奖金呢？与此同时，农民反正不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不该得到补偿，要永远低人一等。农产品价格上升，城里人要得到补偿，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农民不该得到补偿，因为他们不属于既得利益。请问，计划体制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稳定，怎么就不算是农民的“既得利益”呢？农民要是让张教授这样的人计算他们的利益，靠得住吗？

张教授口口声声把“尊重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格局”作为改革的基本原则。请问：如果不触动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还谈什么改革？张教授忘了最关键的一点：改革要对利益受损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但必须是合理的补偿。什么是合理的补偿呢？比如一个工人，一生勤勤恳恳为一家国营工厂服务，没有犯任何错误。但是，改革中这家没有效益的工厂必须关门，他是因为官僚管理的错误而非自己的错误丢了工作，所以应该得到补偿。再看看干部，虽然现在不能垄断软卧待遇，但是，每次招聘公务员都人山人海，乃至参加应聘本身还要花钱买票。在这种情况下，你连下岗工人还打发不了，怎么一天到晚想着给干部补偿呢？

张教授反复讲改革和革命之别，无非是想说，改革是避免革命或者动乱的一个有效手段。但是他忘了，历史上的革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弱势阶层的生活状况恶化，他们权衡了采取各种行动的“机会成本”，觉得革命是一个“理性选择”。相反，在改革中，过去的既得利益集团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但很少造反。原因是，即使在改革后丧失了许多利益，他们在社会上还属于强势集团。比如在 18 世纪的英国，掌握土地的绅士贵族还是控制了各种政治权力。后来工商阶层崛起，挑战他们的权威，但是他们的回应大致有二：一是呆在原来的位置上，因为那虽然不是唯一的垄断性统治集团，至少还是统治集团之一；二是利用原来的优越地位和新兴的集团通婚，或转到新兴集团中。他们最反对的就是革命，因为那会毁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那些有既得利益的人，是最不愿意革命的。一个社会要稳定，就必须给所有人（至少是大部分人）一些既得利益，使他们愿意捍卫他们所获得利益的社会。这是对当今改革的一大挑战。如今中国的干部，大部分还是希望留在原来的位置上。另有不少下了海，生活得也不错。一个头脑正常的人，恐怕不会担心干部出来闹事。相反，一些弱势阶层，到了一无所有、一无所失的地步，最